

# 社会资本范式使用及其理论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童 潇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提 要:** 当下有关社会资本研究,无论是在概念界定,还是在范式使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性。在概念界定方面,目前有社会资本网络论、社会资本规则论、社会资本资源论、社会资本综合论四种界定方法;在范式使用方面,目前也初步形成了结构分析范式、行动嵌入分析范式、功能分析范式、测量分析范式四种主要分析范式。这既使得社会资本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张力,也丰富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研究方向。当前,有关社会资本研究还需要在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属性,拓展对社会资本的“动态”研究,加大对行动者主体社会资本使用探讨,关注社会资本的负向功能四个方面下工夫。

**关 键 词:**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5)03-0129-06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5.03.028

社会资本是国内外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当下,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不断推展和完善之中,突出表现为每年学术界都有这一领域大量的研究文献产生。但是,纵观国内外有关学术成果,应当说,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在概念界定、范式使用等各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的 inconsistency。社会资本理论内部仍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本文拟就国内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现状和张力进行简单梳理和评论。

## 一、社会资本的有关定义

虽然对于社会资本的定義可以在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集体意识”、齐美尔“互惠交换”、韦伯“强制性信任”等那里找到萌芽。但通常认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sup>[1]</sup>。在布迪厄之后,社会学家科尔曼将之系统化,普特南将之推展到了实证研究。之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共同关注的焦点。但是,应当指出,国内外学者在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上并不一致。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界定方式。

(1) 社会资本网络论。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代表主要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我国的经济社会学学者张其仔等。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是从他的“场域”(field)理论出发的。在他看来,所谓“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而场域变化的原动力则在于社会资本。布迪厄进一步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形式之一(另两种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他们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并与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sup>[2]</sup>。布迪厄甚至这样认为,某一个主体所拥有社会资本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他能够有效动员到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sup>[3]</sup>。我国经济社会学家张其仔也有类似的观点。张其仔在

其《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这样写道:“本著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存诸人与人之间;二是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三是既可为公共物品,也可为私人物品。”<sup>[4]</sup>

(2) 社会资本规则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持这一观点。开发署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指出:可持续发展即是通过社会资本有效组织,而扩展人类对机会和能力的选择,从而尽可能平等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给后代人的需要造成损害。社会资本的支持缺失,将使物质财富很难得到正确利用。社会资本还会方便民众的参与;它将推进各部门间的合作,也使满足后代需要的思想变得更易于实现,从而为把可持续融入整个人类的发展事业奠定基石<sup>[5]</sup>。可见,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规则形式,它不仅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还被用于处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的穩定必须建立在各社会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之上。

(3) 社会资本资源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社会学家科尔曼、林南、边燕杰等。他们把社会资本看作为是在网络中运动着的资源,并且认为攫取这些资源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就写道“本书把上述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来……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sup>[6]</sup>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一书中认为:个人有两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获取和使用: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个人资源指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包括了物质和符号物品的所有权。社会资源则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而获得的资源,由于社会联系的延伸性和多样性,

不同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也不相同。进而,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中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这样定义: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sup>[7]</sup>。边燕杰在《找回强关系》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sup>[8]</sup>。可见,科尔曼、林南、边燕杰等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作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其特征就在于它具有某些方面的功能,能为存在于结构内部个人的行动提供相应的便利。

(4) 社会资本综合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帕特南(又译普特南)、朱国宏、林聚任等。帕特南在其成名作《让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就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网络、规范。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并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sup>[9]</sup>。这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资本定义取向。我国社会学学者朱国宏及其学术团队的界定也与帕特南相似。朱国宏等认为:社会资本分为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微观社会资本可被界定为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嵌入在网络中的情感、信任、规则等,行动者为实现一定目标,通过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调动和利用包括经济、信息、机会、劳动力、决策等各种社会资源;宏观社会资本可被界定为一个国家、区域的特征,包括和谐、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等<sup>[10]</sup>。林聚任有类似的观点,他同样指出:社会资本的突出属性就是其社会性或网络关系性。因此,社会资本不是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sup>[11]</sup>。可见,在林聚任这里,社会资本既包含了网络,又包括了资源。

从上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总结可见,在社会资本界定方面,学者间既存在共识,也有分歧。一方面,在共识上,提到社会资本,其概念必然要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这样的概念有所勾连(也正是这样,一些学者近年来提出可以“社会资本”等概念为主要取向,创建“关系社会学”<sup>[12]</sup>)。另一方面,在分歧上,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细节仍有相当分歧。其中有观点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既然是社会资源,其就具有投资、回报性;但一些观点,则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是社会网络,这一含义,意味的是资本本身的实践性<sup>[13]</sup>,其隐含预设在于,社会资本本身并不是资本,而只是资本传输的一种渠道,其实质在于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在笔者看来,在这一层面上理解社会资本,可以认为其是和市场居于同等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还有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是规则、是规范、是信任体系,这意味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文化。

## 二、社会资本的范式分析

研究了社会资本概念之后,我们进一步梳理探讨有关社会资本的分析范式。这里所谓的“范式”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提法。在库恩看来,所谓范式指的是科学发展在某一阶段都具有特殊的内在结构,包括了法则、理论、应用,甚至是自然科学仪器的使用等。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范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完整体。另一方面,它特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

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sup>[14]</sup>。我们这里的社会资本分析范式,即指不同学者研究社会资本所持的不同视角、法则、理路及学术研究不同的路数。在笔者看来,当下有关社会资本的分析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 结构分析范式

无论是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关系网络,还是把社会资本看作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获取),社会资本都与社会网相勾连。自然,网络结构是社会资本分析不可绕开的一环,正是这样,一批学者经过努力形成社会资本的结构分析范式。目前,有关这种分析范式的主要代表有:科尔曼的社会网络封闭、开放的讨论,林南的网络资源观,伯特的结构洞研究,他们各有特色。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讨论了封闭系统、半封闭系统、开放系统中社会资本为其拥有者提供资源的多少问题。他经过比较计算得出结论:在三个行动者所处的封闭系统中(图1),行动者A1、A2、A3拥有相等量的实力;而在开放系统(图2)和半封闭结构中(图3),行动者A1拥有的“实力”要大于A2、A3。经过测算,科尔曼得出结论,在开放式系统中(图2),A2、A3拥有的实力为A1拥有实力的70.7%。而在半封闭系统中(图3),由于A2对A3没有义务,A3的实力仅为A1或A2拥有实力的61.8%<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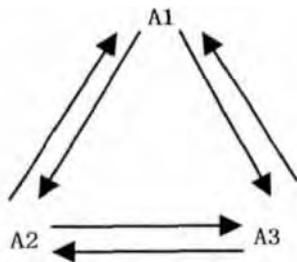


图1 全封闭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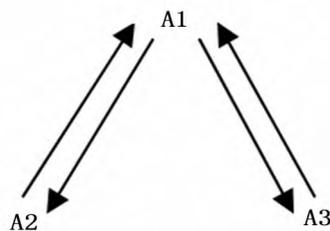


图2 开放式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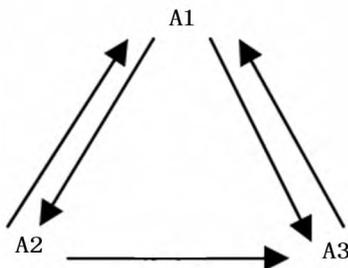


图3 半封闭式系统

注:其中“→”表示“控制力”。

林南则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中论证了七个有关社会资本的命题假设:命题一,社会资本命题: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命题二,地位强度命题: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命题三,强关系强度命题:关系越强,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可能正向地影响表达性行动的成功;命题四,弱关系强度命题:关系越弱,自我在工具性行动中越可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命题五,位置强度命题:个体越靠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命题六,位置与地位交叉命题:对于工具性行动,网络位置(靠近桥梁)强度视桥梁所连接的不同资源而定;命题七,结构相依命题:对于位于等级制顶部及附近和底部及附近的行动者而言,网络运作效应受到等级制结构的约束<sup>[16]</sup>。林南通过这些论题不仅指出了社会资本可以被个人占有,而且论证了社会资本与个人在结构所处的位置有重大关联,这些位置直接决定了个人获得作为社会资本(资源)的强弱。应该说,林南提出的这一系列命题,对社会网络资源结构研究有相当程度的开拓。

而与林南观点相左,博特在其著作《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中则提出并不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同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多寡变量间不具有必然联系。他更倾向于用信息和控制两个维度来观察社会网络结构。在博特看来,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主体,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网络中的任何主体和其他每个主体均发生联系,而不存在关系间断,这时整个网络就是一种无洞状态。而这种情况往往只存在于小群体中。另一种是社会网络中只有某个或某些个体与其他相关个体间发生联系,其他相关个体间没有联系。这种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情况,就好像网络整体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他把这种“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性关系”<sup>[17]</sup>称为结构洞。例如在1、2、3三个主体构成的网络结构中,如果1和2间有关系,2和3间有关系,而1和3间无关系,则1和3就是一个结构洞。博特认为,1和3间结构洞的存在事实上为2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便利,也使其获得优势。因此,任何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相互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信息和控制优势。

## (二) 行动嵌入分析范式

社会资本分析的第二种范式是嵌入分析范式。其中“嵌入”是其关键概念,其内在含义指的是“根植性”,意在表达多数行为必然将“镶嵌”在社会网之中<sup>[18]</sup>,因此,运用社会资本可以解释职业选择、职业行为、社会地位获得等。运用这一分析策略的代表成果包括格兰诺维特、边燕杰、张文宏、周玉等对社会资本的研究。

格兰诺维特在《弱连带的优势》一文中提出了有关关系力量的强弱关系假设。格兰诺维特寻求了四个变量: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程度,他以此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所谓“强关系”,是指在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形成的关系,这些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这些关系群体内部个体的相似性较高,个体间呈现并保持较为频繁的互动,个体间较为亲密;而所谓“弱关系”,则是指那些经济社会特征不同的个体间

所发展形成的关系,这些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同时互动也较少,个体间虽然认识,但关系处于较为疏离状态。在格氏看来,并不能简单地说“强关系”和“弱关系”哪个更好,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和优势。其中,对于“强关系”而言,通过“强关系”所获信息的重复性往往较高,因此,“强关系”通常起着维系群体、组织内部关系的重要作用;而“弱关系”虽然较弱,但它是群体、组织间建立关系的纽带,它却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而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信息桥)<sup>[19]</sup>。在《找工作》一书中,格兰诺维特经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弱关系”所处的结构位置,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使它为个人找工作提供帮助,从而为个人创造例外的机会<sup>[20]</sup>。

在格兰诺维特提出强弱关系假设而创造了行动嵌入分析范式以后,美国华裔社会学家边燕杰及我国学者张文宏等人则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提出挑战。边燕杰、张文宏指出:社会网络在再分配经济和转型经济体制下的作用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作用并不相同。格兰诺维特上述基于市场经济而得出的强弱关系假设在再分配经济中就不一定有适用性。在再分配经济中,个人网络(强关系)的作用往往并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样用来收集就业信息,而是在于施以影响和干预。再分配经济中,求职者即使获得就业信息,但如果没有“强关系”的决策人施加影响,往往亦有可能得不到想要的工作。正是这样,他们指出,在再分配经济中,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亲属和朋友两类“强关系”,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在于提供人情,辅以传递信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的网络<sup>[21]</sup>。边燕杰还通过研究发现,在向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的使用率并没有想象的上升情况,反而有微弱的下降。而“强关系”的作用则持续上涨。表现在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以及依此进行的人情交换不断强化<sup>[22]</sup>。学者周玉对中国干部升迁中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与“关键人”的关系强度在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up>[23]</sup>。

近年来,有关强弱关系假设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孙晓娥、边燕杰研究了我国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情况,他们提出了“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互补”的观点,认为,是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间的跨国合作。从而充实了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求职网络的研究传统<sup>[24]</sup>。

## (三) 功能分析范式

功能分析策略主要是考察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民众之间的关系、民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以及对地区经济、社会、社区发展等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运用综合性社会资本定义所进行的宏观分析。其代表成果包括:帕特南有关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社会资本、美国的社会资本下降的研究,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信任作用的研究,以及我国学者燕继荣对“投资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

帕特南在其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将他所定义的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概念(即信任、网络、规范)运用到民主治理的研究中。他以1970年意大利实行地方分权政治改革后20年南北方呈现的差异为例,分析了

社会资本在推动地方治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该书中,帕特南指出,经过20年的演进,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表现为北部政府绩效突出,公民对社区事务积极参与;而南方地区则相反,不仅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且公民亦毫无“公民心”可言。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意大利南、北方呈现出这样的差异性呢?帕特南对之的回答是社会资本。为了论证他的结论,帕特南将研究追溯到了一千年以前意大利南、北所分行的不同政体——北方是现代意义的共和政体,而南部则是强大的君主政体。帕特南通过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在北方传统的影响下,北方地区赋予公民活动以社会网络和规范,从而使北方充满了活动力;而在南方地区,在传统的影响下则呈现出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以及互不信任的文化,正是这样,才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零碎且孤立,社会易陷入以黑治黑的“西西里化”。从而帕特南得出结论:“互利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正因为这样,大力发展社会资本是使得民主能够运转起来的关键性因素<sup>[25]</sup>。而其另一篇代表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分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问题。在帕特南看来,当前的美国和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19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公民热衷于社团活动,民主空前运转的时代。但是最近30年以来,美国选举参与率显著走低,自愿性参加基本公民组织的人数也显著下降了。帕特南认为,这种公民参与率下降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资本的下降——几十年来,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影响,美国人与其他社区的联系减弱。他以打保龄球方式为例“今天有更多的美国人正在独自打保龄球,但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有组织的保龄球社团却骤然减少了。从1980年至1993年,打保龄球的美国人上升10%,与此同时,保龄球社团则下降了40%。”最后帕特南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公民社会中民主制度运行的基础是公众的“自发参与行为”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网络,而随着公民间“自愿连属”的减少,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下降<sup>[26]</sup>。从而帕特南建立了一个社会资本于社会发展功能性支持的分析框架。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其角度不同,主要是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文化角度出发来解释一个国家私营企业组织以及经济结构的发展状况。在其代表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福山提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而信任又以文化为基础,进而,经信任传递,文化便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福山认为,一般而言,信任关系主要存在于两种组织中间,分别是家庭和社团,社会资本也相应由这两种组织提供。一种是家庭提供的社会资本,表现在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家族主义;另一种则是社团提供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团内部成员互相配合、协同的团体主义。福山认为,由于家庭社会资本以血缘姻缘为基础,因而易造成对非亲族的排斥,所以社会信任程度低,其聚合社会资本的时能力也较弱;而社团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相对家庭聚合程度更高,有利于促进更广泛的信任。福山经过观察认为,信任程度高的高社会资本国家,往往基本社会单位是团体,易于建立能够进行现代化管理的大型私营企业,

进而工作结构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信任程度低的社会资本国家,其社会单位主要以自然的组织形式——家庭为依托,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主要是采用家族主义管理模式的中小企业,形成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因此,福山的结论是: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国家容易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私营大企业,而缺乏社会资本的国家则相反<sup>[27]</sup>。由此,福山构筑了社会资本关系决定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的分析模型。

我国学者燕继荣则进一步提出了“投资社会资本”的概念,在理论层面论证了投资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发展的重要功能和意义。燕继荣指出:社会资本的投资既可源于个人和组织,也可源于国家和政府。前者个人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基础信任上的关系,而后者国家和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则是自愿性组织的发展、社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后者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投资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sup>[28]</sup>。

#### (四) 测量分析范式

社会资本研究的第四种范式是测量研究范式,其关注的是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多少强弱。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社会资本既可以从个体资源层面进行把握,也可以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加以理解,因此,有关社会资本的测量也主要是在个体社会资本和地区社会资本两方面展开。

一是,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主要是对个人网络大小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所进行的测量。目前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个人中心网”测度体系。一般来看,目前测量方法主要包括“提名法”和“定位法”两种。其中“提名法”,主要研究的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连带性”,具体做法是依据个人的提名(如提及多少个与自己亲密的人),及对提名进行阐释(通过回答反映是否与他/她具有亲密关系),而研究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而“定位法”,则主要探讨个人的社会资本质量,寻找个体的网络的规模、结构、网顶(最高认识哪一层面的人)、网差、网络异质性等<sup>[29]</sup>。在我国,一些学者还在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开发出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方法<sup>[30]</sup>,提出了如“春节拜年网”<sup>[31]</sup>研究工具。

二是,地区社会资本测量。与个体社会资本测量相对应,地区社会资本测量的内容主要是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的多少问题。目前,中外学者开发了一些相应的指标。典型的如,世界银行所开发的测度地区社会资本的7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1)团体特性:成员数量,成员在金钱上对团体的贡献,成员参与的频率,成员参与决策状况,成员异质性,团体经济来源。(2)普遍性规范:包括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公平。(3)团结:包括成员相处状况,团结状况。(4)日常生活中社交性: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交往,是否愿意社交。(5)邻里关系:请邻居看护自己患病的孩子,请邻居帮忙照顾患病的本人。(6)志愿主义精神:是否做过志愿者、是否想要去做志愿者、是否批评未做过志愿者的行为,对邻里是否能公平的贡献,是否帮助过他人。(7)信任: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对邻里之间的信任,对其他社区成员的信任,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对工商业主的信任,对法官、法院、警察的信任,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信

任 对地方政府是否信任等。建构了一套体系。在国内,我国学者桂勇、黄荣贵则根据我国情况,设计了一套针对中国社区的社会资本测度体系,一级指标主要包括:参与地方性社团和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社会互动、信任、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等<sup>[32]</sup>。

由上可见,目前社会资本在研究范式上呈现着很大的不一致性,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应当说,这些不一致既使得社会资本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张力,但是,也要指出,正是因为这些不一致,同时也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走向丰富,社会资本研究向更为纵深层次推展,从而推动着社会资本研究的前进。

### 三、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以上,本文综述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范式使用,这里拟就以社会资本研究进行相关评论。

在笔者看来,应该说,社会资本的提出是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至少在两个意义,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学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这一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一直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出过多种解释,诸如企业家的创新、政府的干预、民主的政体等,但是,在以往的研究框架中,社会的概念往往是被忽视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建设、社会发育同样是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这样,投资社会资本应当是政府、企业(社会责任)、民众都必须重视的一项行为。

其次,这一概念有利于社会学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研究工具。虽然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使社会学因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在事实上应当承认,社会学研究的特色性还不强,它常常存在哲学上的理论思辨与实证经验研究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真正可供直接使用的研究工具还不丰富。而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有可能使它成为社会学自己的研究工具,并且由于这一工具能够被量化使用,而使社会学有可能具备与经济学一样的潜力,发展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学术作业流程及特色研究方法(而不是统计学方法在社会学里的简单应用)。

当然,正如本文开篇即指出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目前仍是一个较为新兴的领域,因此,社会资本的研究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完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属性。从目前文献来看,不仅存在着对社会资本概念莫衷一是的困境,并且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已有一种泛化的趋势。在一些学者那里,只要与社会资本相联系的内容都被视为是社会资本本身,甚至认为规范、信任就是社会资本的同义语,应当说,这无疑将削弱社会资本的使用力度。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资本概念和属性的理解。要深入研究辨析社会资本到底是一种传输资源的网络,还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或是两者兼容?进一步,社会资本建构和拥有本身是一个过程,还是一项实体?社会资本如果是资源,其配置是否有帕雷托最优状态?只有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回答清楚,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资本概念的解释力和适度性。

第二,需要进一步拓展对社会资本的“动态”研究。目前,

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还过于静态化。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地区,社会资本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个体而言,“强关系”有可能会变成“弱关系”,“弱关系”有可能也会变成“强关系”(例如,一些领导从原有岗位一退,利用价值下降,有些“白眼狼”就把原有的“强关系”变成“弱关系”),强弱关系也并非非此即彼,中间还有过渡;就集体而言,社会资本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当国家投资社会资本以后,社会资本总量就会出现上升,而这方面研究,除了部分文献以外(如刘林平曾以深圳“平江村”外来人群为例探讨过个体强弱关系的动态变化<sup>[33]</sup>)研究还比较少。

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行动者主体社会资本使用的研究力度,以及社会资本运用的“通透性”。社会资本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部门内部、部门之间也有社会资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资本的概念完全可以运用于分析企业、社区、社团(民间组织),甚至是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络和联系。但是,遗憾的是,目前,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偏重于对个体、小群体和社区的分析,管理学家则偏重于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而恰恰应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团(民间组织)、社工、利益集团、阶层等在社会资本占有上的差异,其社会资本构建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分析确是极其少见(如阶层领域,仅张文宏教授开拓了有关不同阶层社会资本占据的差异的研究<sup>[34]</sup>),但实质上值得研究的内容还很多,如社会资本对于阶层、职业转换的影响等。除此之外,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又有了新的表达,例如当前SNS(社交网站)的兴起,正日益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构筑,社会资本也应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有所作为。

第四,对社会资本负向功能关注不够。从理论来看,社会资本是存在负功能的。这种负功能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社会资本本身对社会的负功能,例如通过“强关系”运作(如“走后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负功能;二是个体使用社会资本对自身的负功能,如某种情况下,使用社会资本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如找熟人购物和到淘宝网上购物)。目前,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多地揭示的是社会资本对个体和地区的益处,虽然也有一些研究已对负功能有所关注(如波茨<sup>[35]</sup>、卜长莉<sup>[36]</sup>、赵延东<sup>[37]</sup>等相应研究),但从整体看研究还较少,主要还停留在思辨的形态,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法)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J].朱国华,译.民族艺术[J].2002(3).
- [2](法)布迪厄·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 [3]Bourdieu,Pie.The Forms of Capital[M]//John G.Riehardso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and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 [4]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7-28.
- [5]UNDP.人类可持续发展[R]//二十一世纪管理议程中心载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打印稿).1995:111,118.
- [6][15]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367-368.

- [7][16]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0, 18, 54-75.
- [8][22]边燕杰. 找回强关系[M]//中国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9][25](美)帕特南. 让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0]朱国宏. 经济社会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78.
- [11]林聚任. 社会网络分析: 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2]边燕杰. 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5).
- [13]宫留记. 资本: 社会实践工具: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 [14](美)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57.
- [17](美)博特. 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8.
- [18][19](美)格兰诺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9, 67-93.
- [20](美)格兰诺维特. 找工作: 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21.
- [21]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2).
- [23]周玉. 干部: 职业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本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24]孙晓娥, 边燕杰.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 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J]. 社会 2011(2).
- [26]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M]//李惠斌.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杨雪冬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7](美)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61-270.
- [28]燕继荣. 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56-176.
- [29]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0-60.
- [30]王卫东.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J]. 社会 2009(3).
- [31]边燕杰, 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M]//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2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1.
- [32]桂勇, 黄荣贵.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 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8(3).
- [33]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6).
- [34]张文宏.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35](美)波茨. 社会资本: 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M]//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李惠斌, 杨雪冬,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6]卜长莉.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J]. 学习与探索 2006(2).
- [37]赵延东. 再就业中社会资本的使用——以武汉市下岗职工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06(2).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SH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0YJC840066)的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董潇(1981—), 男,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社会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及其运用、社会治理、社会组织。